



管窥中国大陆学术风向  
与镜像

1990~2011

**Dialogue with Wang Hui**  
A Case Study of Scholarism in Mainland China (1990-2011)

李小江 著

对话

汪晖

管窥中国大陆学术风向  
与镜像

1990~2011

李小江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话汪晖：管窥中国大陆学术风向与镜像：1990～2011/  
李小江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  
ISBN 978-7-5097-5512-9

I. ①对… II. ①李… III. ①学术研究-中国 IV. ①G3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1236号



——管窥中国大陆学术风向与镜像(1990～2011)

著 者 / 李小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高世瑜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 / 白秀红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6

版 次 / 2014年2月第1版

字 数 / 365千字

印 次 /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512-9

定 价 / 5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录 | Contents

## 导引 / 1

- 1 “汪晖”其人 / 3
- 2 “对话”这事 / 7
- 3 行文体例说明 / 14

## “名”之疑 / 23

- 1 中国：哪一个“中国”？哪一种“中国问题”？ / 26
  - 2 现代：谁的“现代性”？谁家的“现代化”？ / 60
  - 3 国体：帝国、共和国，还是“党国 / 国党”？ / 107
- 小结 / 159

## “理”之疑 / 165

- 1 越界：视野是怎样“跨”越历史的？ / 169
  - 2 判断：叙事“是”如何进入诠释的？ / 202
  - 3 认同：“独特 / 特殊”距“普世”有多远？ / 247
- 小结 / 289

## 附录 关于中国的通信 / 295

- 1 对当代中国研究若干失误的思考 / 297
- 2 中国是什么？中国将是什么？ / 305

# 导 引

2010 年对汪晖而言不是一个轻松的年份。

“汪晖事件”像倒春寒风，在学界造成的影响以及给汪晖本人带来的伤害现在还难估量；于我却像是契机，让我自觉终止了十年隐逸状态，经由汪晖的文本重返主流学界，因此有了下面文字。

我把如下文字看作对话而非独唱，是因为：这里涉及的话题和“现代中国问

题”不是我们任何个人兴之所至有意作为，而是一个时代的思想记录。它不仅记录了思之所及，也留下了思想者探索的足迹：有倒错，有逆转，有血污和伤残……无论多少挫折和失败，总在攀登，企图登顶——这是求学道路极为坎坷却不言放弃的新中国一代学人的集体姿态，在汪晖的文字以及他的言谈中逐一展现开来，逼我驻足反省。

这里汪晖被加上引号特指“学者汪晖”，与私人生活保持距离，与桂冠和污水没有关系，只是单纯地面对他的文字，在他发出的各种声音中摸索他的思维路径。无论我们乐意或不乐意，这些声音和路径像镜子，从中能看到我们自己些许——直观的或变形的——思维影像。

# 1

## “汪晖”其人\*

---

汪晖，男，1959年10月生于江苏扬州，1966年到1976年初在扬州完成基础教育。1976年高中毕业后至1977年，在工厂当临时工和徒工。

1978年汪晖考入扬州师院（前身是近代实业家和教育家张謇创建的通州师范学校，现为扬州大学）中文系，成为“文革”后第一届（77级）本科生。1981年本科毕业，1982年考取本校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5年在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4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唐弢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当时中国社科院二十几个博士生不分学科编在一个班，导师有于光远、宦乡、李泽厚、苏绍智、贺麟、任继愈等，班上许多学生现为中国学界和政经界的核心力量。汪晖强调这个背景：“当时都住在一起，吃饭在一起，讨论也在一起。我从同学们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也许卷入后来的争论，跟这个背景也有一定的关系。”）1988年汪晖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从事文学研

---

\* 汪晖的学术简介主要参考“百度百科”词条和汪晖本人在接受记者访谈时的答问。

究。1989年风波后接受审查，1990年被指派到陕西“锻炼”，在商洛山区做社会调查，参与过人口普查工作。1990年底回到北京。1991年秋以访问学者身份去美国，在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听过课。

1991年汪晖与友人共同创办《学人》丛刊，1993年回国后专注于思想史研究，1996~2007年担任《读书》杂志主编（《读书》在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扮演启蒙角色，在知识界有广泛的影响力）。汪晖接手《读书》后拓展其涉及领域，从沈昌文时期侧重人文趣味和多元文化转向社会科学并直接介入这一时期的思想争论。1997年他在《天涯》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被认为是“新左派”代表，《读书》因此被视为新左阵地。

2002年汪晖受聘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继续思想史研究，频繁出现在媒体和海内外讲坛。1990年代初至今，汪晖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华盛顿大学、北欧（丹麦）亚洲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地做访问研究。

其主要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死火重温》（2000）、《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4）、《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2008）、《别求新声》（2009）、《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2010）和《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2011）。其中《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4卷本，以下简称《兴起》）被看作“至今为止对美国中国研究界的最为全面的批评性反思”。<sup>①</sup> 他的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美国汉学家白露（Tani Barlow）对他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汪晖的影响力超过了学界的许多学者。无论你是不是同意他的观点，汪晖呈现了一个以中国为

---

<sup>①</sup> 黄宗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探寻中国的现代性》，《读书》2008年第8期。



中心的思考模式，从而理解现代中国国家和社会是如何在过去几世纪中兴起的。<sup>①</sup>

如上陈述，一切都在顺理成章的轨道上正常运行。

不期风雨骤至，在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

2010年3月10日，《文艺研究》（北京）刊发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的文章《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指称《反抗绝望》多处抄袭。尽管海内外不少学者称“抄袭说”难以成立，寒风裹挟着污水还是泼满了整个年头。学风之外扯出派系之争，经媒体炒作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于此，我很担心。我相信，但凡经过“文革”见识过“群众运动”的读书人对此都会有所警觉：一场风暴过后难免一片残垣。事发中我曾收到征求签名的信函，此后也看到诸多报道。我的选择一如既往，拒绝合唱，不管谁搭的舞台、唱谁家歌曲。可惜，一人沉默并不能换来天下太平。在今天这个造假成风的社会环境里，民意走向不难猜测。讨伐声此起彼伏，久久不能消散，让人疑惑：是因了如此民意才有了如此风波，还是如此风向挑逗民意为风波助澜？

众声棒喝吊起了我的好奇心，诱惑我去看汪晖的书。

汪晖的书不那么好看，艰涩，拗口，思维跳跃，行文自负，让人心生“六经注我”之疑，几次放下了，却总在骂声中重新拾起来，直到《别求新声》<sup>②</sup>——这个书名唤起了我的共鸣，与我正在经历的“重返经典”意趣相投。待我在他的答问中逐渐看清了他的思路，理解了他的探索……接着是细读，再接着就同当年面对姜戎的《狼图腾》：放下手头事，找来他的文字及有关评论逐一阅

① 《时代周报》记者李怀宇访美国莱斯大学亚洲学研究中心主任白露教授（2010年7月22日）。

② 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摩罗诗力说》），《别求新声 汪晖访谈录》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读——这是我个人很享受的自学方法：在某些领域的学术高端走山脊，认真阅读几个代表性学者的主要著作，沉浸于有血肉的思想去体会生命根底里的砥砺求索。我赞同德国学者史傅德（Fred E. Schrader）从“从具体文本入手，而不是从大的概念出发”的做法，确信：

要了解一种思潮，不如从一位思想家入手，而不要从几个思想家开始，从一点开始铺开。这样可以看到一种观点推理的全过程。<sup>①</sup>

一个出色的思想者走向成熟的思维路径，通常浓缩着一个时代的精神走向。所谓成熟，并不意味着观点“正确”（PC）或者推出了什么“总体视野”，而在于用自己的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我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汪晖，理解汪晖，决定与汪晖认真对话。

---

① 陈乐民、史傅德：《对话欧洲：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晨枫编译，三联书店，2009，第109页。

# 2

## “对话” 这事

---

“对话”这事看似简单，其实是需要条件的。尤其是学术对话，除去天时地利等外部因素，还需要相应的知识积累和一些人文条件。这些条件通常隐于幕后，在貌似平等的表象下不露声色。条件是否到位及其是否丰富，直接影响对话质量。条件越充分，对话过程就越可能是向善的，让参与其间者都有收获。

就对话条件而言，我得做些必要的交代：以“学者汪晖”为主要对象，看我们的对话是否成立以及如下对话是在怎样的基础上展开的。

首先是**共同点**。

相似的志趣和目标是学术对话的首要前提。否则不必说什么，开战打仗就是了，“文革”中的大辩论有许多如此不良记录。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地方以及“文革”遗风犹存的学界，这种提示并非多余。学术对话基于共同关注的问题，在目标上也是一致的：这里没有各怀鬼胎的容身之地，一切坦然敞开心在阳光下。对真正的学者而言，没有任何特殊的个人目的，无论出自什么角度，有多少不同观点，学术目标只有一个：**真**——务实求真，揭示真相，坚持真理。

就个人身份而言，我和汪晖有不少相似之处：都是1950年代人即典型的新中国人，以不同形式亲历了中国社会半个多世纪的巨大变迁；都在“文革”之后进入高校，都从文学研究起步，都在1990年代初出国做访问研究；有相似的思维走向和许多共同的学界朋友，学习和熟悉了西方经典理论和各类学人，因此有相似的体验并遭遇到一些相同的问题——千万个问题中，首当其冲的是“中国”。

1991年秋，在美国加州大学（Berkeley）中国研究年会上我第一次在海外听中国研究学者谈论中国——不幸，那些个“中国”让刚刚离境的我感到非常陌生。是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我认识了刘禾<sup>①</sup>，曾经就这样问她：“他们在说谁？”也是那个时候在哈佛那个著名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我和苏绍智先生<sup>②</sup>几次长谈，他给我的问题如出一辙。1992年回国后我即应约给他回信，题目就是“中国”。<sup>③</sup>日后数十次出国、上百次讲学，讲的总是一个题目：中国。遗憾的是，十几年过去，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变，海外的问题依旧蹒跚在ABC，讲者仍然要迎合西方标准用西方话语对中国事情做基本启蒙……这让我十分厌倦，导致最终断然谢绝出国讲学，也放弃了因爱因斯坦而让我向往已久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s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in Princeton, 2006/2007）发来的邀请。从那个有幸入选的名单上看到另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汪晖——只是从这里，我得到汪晖的地址，却不认识他，更少看他的书。我早听说他是个苦读书、整天泡在图书馆里认真做学问的学者，而当时我的全部心思都放在“走田野”，对书

① 刘禾，女，时为美国加州大学（Berkeley）助理教授，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② 苏绍智，时为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

③ 详见本书附录“关于中国的通信”。

本中各种教诲少有兴趣……就这样，尽管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和相识的机会，却都错过了——如此错过并不奇怪，1990年代以来，学界同人各自行路少有交流。“八十年代”伙伴多居海外，出国常有回家的感觉，在国内反倒像自我流放。除此之外，我与汪晖错过，还因为我们在不同领域里走的是不同的研究路径——恰恰是这个不同即所谓“差异性”，成为我们可能对话的重要基础。

差异性是对话的必要条件。

有差异就会有不同的视野和观点。有所不同，才可能在相互敞开的对话过程中不断揭蔽，在同一主题下获得深入的认识。

我与汪晖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

一是学术层面上的。

作为学者，虽然同是文学出身，却不同领域不同方向（汪主修中国现代文学，我的专业是西欧文学），学术路径也完全相反：西方是我的学术起点，日后转向中国本土，与我的性别身份和妇女研究有直接关系。严格地说，我是通过“女人/性别”这个渠道进入中国研究、进入现实问题的。整个1990年代我基本上在跑田野，即使出国，也多是实地考察和做口述访谈。我与文本/文献拉开距离，一则出于对西方中心学术标准的怀疑，本土化和考察中国成为我有意选择的学术方向；二则出自对意识形态史学的抗拒，边缘化和边地成为自我放逐的首选之地；三则基于对主流社会和传统文化男性中心性质的警惕，迫使我向生命本体去寻找“真实”，因而转向口述史。总的去向是本土、边缘，趋向实证和个性化的。汪晖在历史文献和前人字纸中追寻“现代中国”兴起思想印记的那十几年中，我却真是“脚踏实地”亲身亲历亲眼见证着“现代化中国”的崛起。当他谈论西藏、琉球、东北亚以及民族国家问题，我却实际走到那些边僻之地和少数民族中间，访问彝族毕摩、纳西东巴、摩梭土司、回族阿訇、藏教活佛以及众多民族文化遗产人，走访朝/韩两地和延边地区乃至整个大东北。当汪晖书写“现代性”并对

“现代化”本身进行反思，我正走进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去到沿海诸多开发区和边疆最早启动的边贸点，看“现代”实际上是怎样进入中国社会、进入民间生活的。当汪晖由文学史转入思想史，力图与国际学界接轨对话的时候，我却面对西方学界公然宣称分离，并身体力行拉开了距离。<sup>①</sup>当他把矛头指向国内新启蒙主义并高度评价海外“年轻中国学者”的“超越”时，<sup>②</sup>我却公开与那种在概念里把玩中国的凌空姿态分道扬镳。<sup>③</sup>1991年他进入《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写作，正当我启动“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sup>④</sup>，并着手筹建“妇女文化博物馆”<sup>⑤</sup>……可是，新世纪伊始，当他行走世界答问天下，我却重归案头在学术上还乡——由此可见，即使我们都面对世界、怀揣中国，路径相反、方向不同，终究难得相遇。

二是从现实层面看，作为社会中人，我们也有很大差异。

首先是性别差异。就性别意识而言，汪晖在当代中国男性学者中是少有的清醒者。他很清楚性别视角的重要性，少了就称不上“现代”，因此总能自觉地将多元视角用于批评实践，对女性主义给予理解和同情。但性别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会以不同形式体现在学术观念中，成为丰富对话的重要因素。从认识论角度看，性别是视角，也可以是一种方法，先天超越国籍或阶级身份，因此可能先

---

① 1991年12月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与 Paul Cohen 教授对话中国民族问题；1992年1月在墨西哥学院与 Flora Botton 教授谈到发展中国家的不同道路；与美国东北大学 Patric Manning 教授对话“全球史观”；1992年2月5日在哈佛会议上首次公开批评西方女权主义引起所谓“哈佛风波”。

② 参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③ 参见《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前言，李小江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④ “妇女口述史”项目起于1992年，现有口述档案2000余万字。最初成果为“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让女人自己说话》，四卷，三联书店，2003。

⑤ “妇女文化博物馆”的筹建起于1990年，2002年在陕西师范大学正式建馆（长安校区图书馆西副楼三层），网址：<http://www.snnu.edu.cn/wcm>。

验地与民族主义保持距离，在全球化视野里显示出跨文化研究的天然优势。

其次是派别问题。“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之争已经持续十几年，尽管汪晖本人并不认同任何派系标签，“新左派”的标志还是与他的声名一同远播内外，成为一个既成事实。那么我呢？早有海外学者问我：你是哪一派？国内却少有人在派系问题上给我命名，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性别，我做妇女研究也已成为一个历史的符号，改不了也抹不去，与“后现代政治”和“政治正确”的新左派有着天然的盟友关系。女权主义者（不管你是否认同这个称谓）是天生的左派。另一个原因完全相反，作为个人，从拒绝入党从政到拒绝参加“合唱”、从1994年退出联合国人口发展大会到1995年拒绝参加（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从1999年以后谢绝诸多海外学术活动到完全退出“江湖”……不仅影响到个人的政治处境，也决定了我在学术风格和研究路径上鲜明的自由主义倾向。我提出的“小北京、大中国”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它于我个人是政治宣言，也是行动纲领。对参政意念下的学术思维，我有抵制，因此可能超越“左/右”之争，在各个方向结识并存留下诸多推心置腹的好朋友。尽管如此，学人眼中我是有界别的：“女界”——这与我在1980年代“中国妇女研究运动”中的历史作为有关。<sup>①</sup>女界在当代中国看似解放和开放，实则是一个非常封闭的领域。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像一座巨型玻璃暖房，罩住了中国女人几乎全部生活，给出了看似开阔的社会平台和有指标的政治保障，却极大限制了她的认知视野和进取的步伐。走出女界的隐形屏障，就像汪晖企图超越派别，在我是一件警钟长鸣的事。因为我很清楚，只有在精神上和思想上超越女界，才可能与世界与学界有更

<sup>①</sup> 详见李小江主编《中国个案：妇女研究运动》，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9。

深入的对话。

再次——我看最重要——是对“文革”的历史记忆。虽然都是1950年代人，但我长汪晖八岁，因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各自的“中国影像”可能存在着代际差别。我属于“老三届”，从大串联到大批判以及整个十年浩劫，我是亲历者。日后成为“知青”上山下乡（两年半）以及进入工人阶级（八年半）的经历，也会在“中国认知”方式上烙下不同的经验印记。但凡在新中国经历过政治运动、受过磨难或受到牵连，经过“文革”、做过知青或干过苦工……听多了无处不在、周而复始、欲盖弥彰的高调谎言，见识过中国人落到谷底却无处挣扎的万般无奈，都不会轻易相信只在字纸文献中推演出来的现代中国理论，也不会轻率地认同今天这样的“崛起”以及在它的名义下、用它的话语编织出来的合法性辩护。

说到这里我想坦白，曾经的我，因为生长在大学校园接触过太多读书人，对从书本到文本的做书人多有成见。如此情境中，即使相同学术方向、同样性别，我恐怕跟汪晖走的也会是不同的道路——不期，恰恰是这些“不同”成为我们各自行文立论的思想资源，成就了良好的对话基础。选择“对话”这种方法，不是刻意迎合后现代学术风向，而是因为此前我们在各自领域中已经有了对话意识和相关的学术准备。我的《后寓言》<sup>①</sup>和《女人：跨文化对话》<sup>②</sup>都是证明。汪晖的文字主要也建立在对话批评的基础上，呈现出“万向节式”的开放形态：带着现代中国问题与历史对话、与古代思想家对话、与西方学界对话……特别是他的《兴起》，如

---

① 笔者在《后寓言：〈狼图腾〉深度诠释》（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中提出“后乌托邦批评”，以《狼图腾》为蓝本尝试与“三后”（后现代、后殖民和后乌托邦）相关的“对话批评”，从不同学科方向深入检讨当代世界学术前沿诸多重要问题。

② 《女人：跨文化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出自笔者与海外学者的直接对话，涉及大量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其政治性远在学术性之上。



黄宗智所说：

实际上，它是一本关于观念的历史化的著作，是一本中西思想相互对话的著作，一本过去与现在、思想与历史情境相互对话的著作……汪晖非但没有漠视话语之外的历史，还持续不断地去追踪它，他也不是为了话语而话语，他的目的是为一个新的中国建立一种新的视野。<sup>①</sup>

对话的学术目的是揭蔽和创新。

对话的学术前提是重读经典。

用对话的方式激活文本，在对话过程中重新解释。所谓创新，是在“重读/重释”的过程中自然生发出来的。对话批评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这里不赘言，将在“对话汪晖”的实践过程中逐一体现出来。

---

<sup>①</sup> 黄宗智：《探寻中国的现代性》，《读书》2008年第8期。